

唐代于阆的童蒙教育^①

——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习字文书为中心

陈丽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和田汉文文书中的习字部分进行分析，通过研究习字文书的内容、形式，进一步讨论文书的写作时间、习字者以及年代背景等相关问题，从而了解唐朝统治时期于阆的汉化教育以及中原文化对于阆的影响。

关键词：习字文书 童蒙教育 于阆 中原文化 和田文书

中图分类号：G6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14) 01—0039—07

DOI: 10.3969/j.issn.1002-4743.2014.01.005

于阆（今新疆和田），从公元2世纪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绿洲王国活跃在历史舞台。《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阆史料概述》^②中将中古于阆史料分为文献和文物两种，其中文献包括（一）于阆自有语言和文献；（二）汉文正史、佛教史传、行纪、笔记；（三）吐蕃文献，并认为汉文文献是研究古代于阆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是“解开于阆文或藏文有关史料疑难处的一把钥匙”。而目前对于阆的研究多在历史、佛教方面，而在文化教育方面少有涉猎。以1913年王国维为罗振玉刊布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写的跋文《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为发端，开启了对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③在敦煌的蒙书教育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敦煌以西的地区却少有问津。本文将从于阆习字文书出发，对于阆的教育情况进行一些分析。

2009年末，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以下简称人大博物馆）获赠一批和田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以此为中心，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中汉文部分的习字文书进行分析研究。

一、从习字文书看唐代文化对于阆的影响

（1）《急就篇》

编号GXW0072文书正面为《天宝九载粮历》，记有“天宝九载七月”字样，习字面存9行，

① 本文引用文书录文、定名等皆系荣新江教授主持的“人大博物馆藏和田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的集体劳动成果。谨致谢忱。

② 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阆史料概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此据作者：《于阆史丛考》（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③ 王金娥《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

首行习“张”字，第2~9行习“泣”字，其中“泣”字笔迹较粗，可能是按《急就篇》的“哭泣祭醢坟墓”^①习字。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由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著，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产生年代最早的蒙书，全书今本共34章，以韵编成，由姓氏名字、服器百物、文学法理三部分组成。以七言为主，三、四言次之，用字2144个(一般认为最后两章128字为后汉人所增)^②。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提到“然而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③可见从汉至唐，《急就篇》都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十分流行。

(2) 《千字文》

编号GXW0068文书正面为一残牒，习字面存3行，首行习“声”字，次两行习“虚”字，应是《千字文》的“空谷传声，虚堂习听”^④的习字。

GXW0450号文书存3行，首行残缺，辨认不清。次行习“欣”字，尾行习“奏”字，应是《千字文》的“欣奏累遣”^⑤的习字。

文书GXW0232号223g存4行，均习“昃”字，应是《千字文》的“日月盈昃”^⑥的习字。

文书GXW0275号241a存2行，每行存3个“荒”字，与上述的《千字文》习字形态相似，应是《千字文》的“宇宙洪荒”^⑦的习字。

文书GXW0275号241e存1行，存6个“盈”字，应是《千字文》的“日月盈昃”^⑧的习字。

上述五件文书，除GXW0068号文书外，从内容、书法的纸张形制来看，很可能是同一人的习字，字体工整，书法颇佳。

《梁书·周兴嗣传》载“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⑨故《千字文》是周兴嗣受梁武帝之命编写的一部识字读本。另《尚书故实》载“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段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十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⑩可知《千字文》的创作与王羲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千字文》在唐代十分流行，是童蒙

① (西汉)史游《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第22页。

② 关于《急就章》的版本、内容、异文的考证可参看：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刘伟杰《〈急就篇〉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4月)、张传官《〈急就篇〉人名“慈仁他”校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张传官《试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

③ 《急就篇》，《急救篇叙》，第2页。

④ 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中华书局，2010年，第109页。

⑤ 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第124页。

⑥ 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第103页。

⑦ 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第103页。

⑧ 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第103页。

⑨ 《梁书》卷四三《文学传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698页。

⑩ (唐)李焘《尚书故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第467页。

教育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教材，敦煌文献中残存有关《千字文》的卷子就有近 50 件，^① 可见《千字文》在西域童蒙教育中的重要程度。

(3) 王羲之作品的习字文书

在新出和田的习字文书中，有几件特别值得关注，即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文书，关于这部分，荣新江教授已有专文讨论，^② 故此处只对《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文书形态作一些补充说明。

GXW0125 号文书共为 5 个碎片，047a 共 7 行，首行习“吾”字，第 2~5 行习“弗”字，第 5~7 行习“及”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佳，为教导者所写。047b 共 1 行，存三个“吾”字。047c 共 1 行，存 4 个“吾”字。047d 共 1 行，存 3 个“弗”字。047e 存 7 行，前 3 行习“吾”字，第 4~6 行习“弗”字，第 7 行习“及”字，第 5 行末有一“之”字，盖充分利用纸。每三行换一字，类 GXW0171 号文书上所书。荣新江教授认为，此五件“均为‘吾弗及’三字的习书，应当是五行换一字，据 S. 214 写本保存的文字，当是《尚想黄绮帖》最后三字的练习。纸片虽残，但确实书圣王羲之帖文的习字，极为可贵”^③。

除此之外，笔者发现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第 V、VII、VIII 号遗址挖掘的 18 件汉文契约中有一件习字残片 (M. T. C. 006)^④，a 面上残存“当”字 2 行和“抚”字 4 行，b 面残存“欣”字 1 行和“俛”字 2 行。无独有偶，“欣”和“俛”刚好对应《兰亭序》中“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间”一句，此句有“俛仰之间”和“俯仰之间”两种写法，查其他西域、敦煌出土的《兰亭序》文书，如敦煌出土的 P. 2544 正面是一部诗文集，其《兰亭序》部分的这一句中正是“向之所欣，俛仰之间”，为 M. T. C. 006 (b) 乃《兰亭序》习字提供了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习字中间存有学生的题记“补仁里祖为户口生李仲雅仿书册 [四十] 行谨呈上”，荣新江教授认为此与 1969 年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氏注》抄本的题记相似，认为“这里（于阗）的教育，至少是汉人子弟的教育和内地没有什么不同，学生都遵循一定的规范读书习字”^⑤。

以上文书都显示了同一主题，即唐代文化对于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只是书籍方面，还有精神层面的影响。《千字文》的流行本来就与唐代君臣推崇王羲之的书法有关，如唐太宗曾写过一篇《王羲之传赞》，称王书“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并几度寻《兰亭序》真迹。^⑥ 其后武则天、唐玄宗也对王书极力推崇，^⑦ 《旧唐书·王方庆传》载：

①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② 参见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099~1108 页）及《〈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流传》（2011 年故宫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③ 参见荣新江《〈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

④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pp. 204. pl. XXXII.

⑤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 8 页。

⑥ 《兰亭始末记》载“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翫书。临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后更推究，不离辩才之处，又敕追辩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唐〕何延之《兰亭始末记》，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2 册，第 155 页。）

⑦ 关于唐代君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可参见陈秀杰《唐代书法教育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 5 月，第 5~10 页。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①

这种崇尚王书的风潮还影响广泛，而在于阆也发现了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文书，更证明了唐代崇尚王羲之书法的风潮也传到了西域地区，并且渗透到儿童教育层面，可见其影响之深。^②

二、从某孩童习字看于阆的童蒙教育

在人大博物馆藏习字文书中，有一些文书从内容形态分析，笔者认为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习字人之手。

GXW0171号文书由四残片缀合，正面为《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共7行，前6行字迹较为工整，记载焉耆和吐蕃的战事威胁，尾题“大历十年四月 日典成公解”。第7行，字体较大，行书潦草。背面为习字，存15行，首行残缺，可能为“开”字，次行以“十二日”起，后接“门”习字。“门”存5行，“问”字存7行，未有一“之”字。“闻”字存2行，每行约16字。此“十二日”应为习字日期，说明可能逐日习字。行最末有一“之”字，盖为充分利用纸。《大宋重修广韵》有载“门，问也，闻也。”^③因此也有可能不是按韵，而是按韵书或是其他规律。习字每行首字体较工整，应为教导者所写。每行下面部分为学生习字。

GXW0172号文书由三残片缀合，正面为《唐某日六城拔伽知事萨波文门某状》，共5行，字体较大，较为潦草。背面为习字，共14行，字数不一，最多为21字。前两行写“下”，第3~5行习“不”字，第5~8行习“少”字，第9~11行习“白”字，第12~14行习“史”字。尚不知以何顺序习字，有可能是部首笔画。第7行开头有“廿九日”，可见同为逐日习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为工整，为教导者所写，体例类GXW0171号文书。从书法、纸张和内容来看，两者应是同一个学生的习字之作。

GXW0118 + GXW0119 + GXW0120 + GXW0121 + GXW0122号，此件为五个文书碎片缀合而成。正面为《唐某牒为巡探事》，共5行，字迹工整，有一行为断片，位置不确定，反面为习字，共6行，每行字数不一。最多为15字，头两行习“水”字^④，其末尾皆有一“之”字，同文书GXW0171极其相似，如“谨”“来”等字，很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第3~5行习“好”字，第6行习“合”字，也可能按笔画顺序习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佳，为教导者所写。从文书内容、字体和形态而言，应和GXW0171文书为同一学生习字之作。

GXW0191号文书为两残片缀合，此件可能原是上下两层纸粘连在一起。上层为习字文书，下层为公文。上层残留右半部分，下层残留左半部分，二者粘在一起，表面看似为一张纸，实际不然。上层右边为习字，共7行，每行字数不一。首行写“守”字，第2~4行写“捉”字^⑤，第6~7行为“碟”字，此应为按照某文书习字。第2、4、6、7行末均有一“之”字，每三行

① 《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99页。

② 参见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

③ 《北宋》陈彭年，丘雍等编修《大宋重修广韵》卷一，泽存堂本，第63页。

④ 此字看似“永”字，但习字均无点，故更有可能是“水”字。

⑤ 按照一般习字习惯，一行写同一字，此处可能有行数对应错误，第5行同。

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佳，为教导者所写。下层左边为《唐杰谢镇上守捉状为巡探事》，共9行，字迹工整。同GXW0171号和GXW0118-22号文书上的极其相似，如“谨”“来”等字，很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留有习字痕迹，依稀可辨认出有“闭”“开”“坎”“城”等字，这也与GXW0171号文书上的内容吻合。故从文书内容、字体和形态而言，应与GXW0171文书为同一学生习字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习字文书中“坎城”是于阗文书中常出现的地名，可能来自于阗语中的地名Kamdv^①，而“守捉”则是唐代的驻军机构，可见这件文书中的习字多是对官文书中的某些字的习字，可以为分析其他文书习字规律作参考。另，GXW0064号文书正面为《唐某年于阗镇守军牒质逻、藁城等守捉为摊市袋索等事》，共7行，字体工整。习字面共5行，字体较大，每行字体不一，首行写“延捉来”，次行开始习“虞”“候”“勒”等字，没有统一规范。这里也是和官文书相关的习字，可作印证。

根据以上文书（除GXW0064号外）以及五件《尚想黄绮帖》习字文书的字体、文书形态和习字规范等，笔者将这些比定为同一人的习字，这不仅对研究这些习字文书的官文书有参照，由此亦可以得出一些当时儿童习字的规范：儿童按照日期习字，应该是有一定量的要求的。习字按照一定的规律，有可能是按韵书或是其他字书习字，甚至有些是临写官文书，多是一些日常用字。习字不是按照某一版本，而是由教导者先在纸张上书写，再由儿童临写，一般情况下每字三行。^②从在官文书背后习字以及充分利用纸张剩余空间来看，当时于阗的纸张比较短缺。

关于这些文书的年代，荣新江教授认为，人大博物馆藏和田文书中虽然有一部分是武周时期，但《兰亭序》的临本更可能是于阗汉文文书写作最为盛行的8世纪后半叶。^③所幸在GXW0171号文书正面载有“大历十年四月”，一般情况下正式文书不会写在有习字痕迹的纸张上，且有些习字是按照官文书中的字，如GXW0191号文书，故习字部分应在大历十年（775）之后。由于大部分习字应为一人所习，因此这些习字文书的书写时间在8世纪后叶，这与荣新江教授的推断有所呼应。另外，GXW0072号文书正面也有“天宝九载（750）”字样，可以推定除去这一学童的习字文书外，其他文书也可能属于8世纪后期。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这段时间的于阗国王是尉迟曜（Visa' Vāham）。^④GXW0171号文书《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称“访闻焉耆贼军未解，吐蕃多情”，正是说明于阗当时的处境比较险恶，与中原的联系有所中断。于阗甚至不能及时知道唐朝改年号，这在之前的出土文书中早有反映，在本批文书中也有不少体现，如GXW0166号文书中记有“大十五年”（即大历十五年）、“大十六年”（即大历十六年）等字样，还有GXW0070号文书“大历十六年”字样，可知当时于阗并不知道唐朝在大历十四年唐代宗“驾崩于紫宸内殿”^⑤，唐德宗李适即位，改元建中。

① 文欣 《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第32~53页。

② 荣新江教授在《〈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一文中认为“至少从武周时期（可能要提前到喜欢王字的唐太宗时期）开始，《尚想黄绮帖》就成为天下各州学生的习字标本，每字两行的规矩也可以从敦煌写本羽664号等得到印证。”但在和田出土的《尚想黄绮帖》习字文书中，多是一字三行。

③ 荣新江 《〈兰亭序〉在西域》，《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第1106~1107页。

④ 荣新江 《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原载《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9~361页，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240~263页。

⑤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页。

三、其他习字文书

除去上面的习字文书之外，还有一些文书字迹不清或是过于零散而无法认知，也记录如下：

GXW0193号共5行，首行习字，分别是“悲”“帐”，后四行似为书信或文学作品，字迹较为潦草，不像学童习字之作。

GXW0123号045c共5行，每行仅存一字，前两行仅存某字一部分，笔者认为可能是“党”“赏”之类的，后三行均一“应”字，字体较佳，可能是教导者所写。有可能是上述学童的习字。

GXW0123号045g共三行，每行仅存一字，首尾两行仅存某字一部分，首行应是门只是字的一部分之类的，可能和GXW0171号有关。后两行均一“南”字，字体较佳，可能是教导者所写。

GXW0126号048d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4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11行，每行字数不一，前三行为“门”字，第4~6行习“国”字，第7~9行习“也”字，10~11行习“及”字，每三行换一字，可能与047相接，首字字体较佳，为教导者所写。

GXW0126号048e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6行，每行字数不一，前2行习“国”字，第3~5行习“也”字，第6行习“及”字，每三行换一字。

GXW0126号048f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4行，每行字数不一，较为模糊，第2~4行习“双”字。

GXW0126号048g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5行，每行字数不一，较为模糊，辨认困难。

GXW0126号048h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4行，每行字数不一，较为模糊，第2~4行习“闻”字，可能与GXW0171号文书相关。以上GXW0126号文书较为残破，但根据文书形态似可缀合。

GXW0064号文书由两张纸黏合而成，正面为《吴紫慈等粮帐》，存6行，墨迹较淡，辨认困难。背面为习字，存17行，前3行习“来”字，第4~8行习“仁”字，第9~13行习“内”字，第14~16行习“东”字，17行残损，按每五行换一字的体例应也为“东”。书法不佳，应为学童习字。

GXW0217号文书正面为《唐谋常、崑岗等馆用粮帐》，存6行，习字面共3行，前2行习“庭”字，第3行习“李”字，墨迹较淡，字体不佳，应为学童习字。此可能为“李庭湊”的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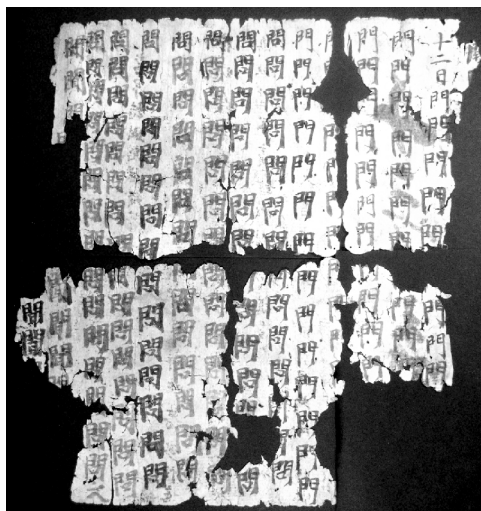
文书GXW0271号238c由两残片黏合而成，存3行，首行习“重”字，第2~3行习“师”字，前两行未有倒写“德”，应为黏合的另一半。

这些文书因本身残破或是字迹模糊不清使我们无法从中获知更多的信息，但是可以据此探讨这些文书有可能是由哪些人所写。这批文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习字为目的，如《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的习字，书写水平较低，应该是学童所写；而另一类是以研习书法为目的，如《千字文》的习字，这些习字本身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故习字者应该年龄较大而非刚刚起步的学童。另外，这些文书大多是正式文书和帐簿的再利用，故这些很可能是驻守在于阗的

汉人子弟的习字。自唐朝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①唐朝和于阗的交流不断加深：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巴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②

从上可知，自武则天时期唐朝开始派汉军驻守于阗，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四镇抵御外敌的能力，有利于唐朝更有效地控制西域地区，这些驻守于阗的汉兵必然会与当地的官员、百姓接触，由此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于阗文化的交流，而汉人子弟在于阗的教育应该也会影响到于阗的文化教育。



GXW0171 号文书



GXW0125 号文书



GXW0450 号文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荣新江教授、孟宪实、毕波老师的指导，特致谢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载：“(上元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伏闾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伏闾雄有击吐蕃功故也。”(第99~100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第5304页。

demand for fabric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The third , numbered GXW0163 , is in fact a Chinese document marked with Khotanese phonetic symbol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languages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s of these 3 documen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se 3 documents belong to the same time and may come from the same site , reflecting production , life and inhabitant in Jiexie in the last 30-20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 and being worth further studying by combining with other literatures.

Key words: bilingual document; Khotansese; debt; textiles; Jiexie

Childre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t Khotan in the Tang Dynasty:

— *Focused on the Copybook Documents from Khot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 Lifang (39)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opybook documents from Khot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s and form of the documents as well as their dates of writing , exercisers and background. It also studies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Khota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s of inland culture upon Khotan.

Key words: Copybook Documents; Childre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Khotan; Inland Culture; Khotan documents

The Western Regions'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 in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n Xiang (46)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raders from Central Asia were active on the Silk Road and even in southern China besides Chang'an and Luoyang in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ome of them came to the imperial court by the name of tributary envoys and some settled down permanently after years of trading. They were ruled and relied heavily on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local powers.

Key words: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rader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Silk Road; Sogdiana; the Sixteen Dynasties; the Northern Wei

Horse Import Channel of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hi Yuntao (53)

Frontier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legraph Lines in Xinj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Wang Dong (62)

Song Jiaoren's Knowledge of Russian Invasions arou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an Minfang , Zhao Peng (69)

Abstract: Arou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 Song Jiaor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mperialist powers' aggression on China's borderlands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to analyze the six claims raised by Russia in "Disturbance of Russian Espionage" in 1911. In these articles he put forwar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 exposed Japanese and Russian schemes of aggression against northeast China , reminded a trend of Japanese-Russian collaborating to invade northeast China , and revealed Russian ambition to aggress on Chinese Mongolia. These articles displayed his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anti-aggression and brimmed with spirit of patriotism. However , his proposes are not all to the point. Some of them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political propaganda because they cannot stand scientific deliberation.

Key words: Revolution of 1911; Song Jiaoren; Disturbance of Russian Espionage; Japan-Russia Alliance; Outer Mongolia; "Yili Treaty"